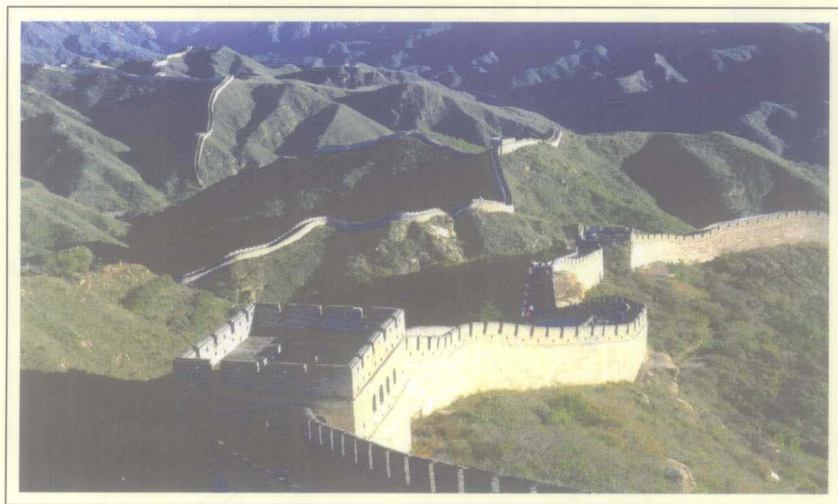


中国年鉴学研究

· 卢万发 主编 ·

ZHONGGUO NIANJIANXUE YANJIU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中国年鉴学研究

卢万发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年鉴学研究 / 卢万发主编.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0. 12

ISBN 978-7-80752-734-3

I. ①中… II. ①卢… III. ①年鉴—研究—中国
IV. ①Z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7404 号

中国年鉴学研究

卢万发 主编

责任编辑	黄云生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8) 84122206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60mm×185mm
印 张	47.625
字 数	110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734-3
定 价	2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序

年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名副其实的舶来品。但从宣统元年（1909年）奉天提学司使卢靖组织编译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说起，这一舶来品在我国已有整整100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年鉴工作，年鉴事业蓬勃发展，早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年鉴学”，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年鉴理论体系，是当代年鉴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年鉴理论研究还相当滞后，四川的年鉴理论研究工作更是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由卢万发同志主编的《中国年鉴学研究》一书即将由巴蜀书社出版，该书的问世，不仅填补了我省无一年鉴学专著的空白，而且必将有力地促进全省乃至全国年鉴理论研究工作，实属可喜可贺，故而为之作序，以示鼓励与支持。

现代西方年鉴被称为“刊中之王”，有人甚至把年鉴看成是“具有政府公报性质的蓝皮书”。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在三十多年前就站在“四化建设的需要”、“国家的需要”的高度诠释年鉴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他老人家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我国的年鉴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仅从发展速度上看，平均每年新增近200个品种的业绩堪称世界之最，但从机构建设、队伍建设、理论建设上看，特别是从质量和效益上看，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的确很多，前景令人十分担忧。那么，年鉴工作怎样才能信息化与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把握先进、赢得主动呢？又怎样才能弘扬良好思想道德风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呢？我认为，《中国年鉴学研究》一书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了宝贵的探索与研究，对于各级各类年鉴的编辑出版和管理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是广大年鉴工作者不可不看的理论著作。该书共分“年鉴基础理论研究”、“综合年鉴的编纂”、“专业年鉴的编纂”、“年鉴管理工作”、“外国年鉴简介”等5个部

分，约一百万字，涉及年鉴工作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的不可多得的年鉴学论著。

放眼看看世界，通过学习了解国外编辑出版年鉴的成功经验，从而找出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之处，并主动调整战略决策与措施，也是我国年鉴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所谓“鉴西窗之风雨以明晴晦，览各地之起落而知兴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年鉴学研究》一书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譬如，专门设置“外国年鉴简介”篇，对美国、英国、日本、法国、韩国等国家的年鉴进行了比较分析与研究，实属难能可贵。该书洋洋洒洒上百万字，其中有一百多处提到年鉴的“理论创新”与“社会实用性”问题，这不是简单的重复与强调，更不是江郎才尽的表现，而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与关键。换句话说，该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创新”与“实用”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年鉴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作出了比较科学合理的阐述，给我们很多启迪与启示。

的确，一个时代的进步，一项事业的发展，都是以实践基础上的思想变革、理论创新为先导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每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问世，都会极大地推动社会实践活动，引领时代潮流奋勇前进。年鉴理论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做到“实用”。因为，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只有“有人用”，而且“有许多人用”的年鉴才能生存和发展下去，那些实用性较差，以记载一般行政事务为主体，对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明进步作用不大的年鉴，迟早会被叫停的。

学无止境，希望卢万发同志能够在年鉴理论与编纂方面继续努力探索，取得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为全省乃至全国年鉴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马小彬

2010年6月8日于蓉城

前 言

年鉴虽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但从宣统元年（1909 年）奉天提学司使卢靖组织编译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算起，这一舶来品在我国已有 100 年的发展史，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由于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年鉴工作，年鉴事业蓬勃发展，早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年鉴事业更是以平均每年新增近 200 个品种的业绩在发展，其发展速度堪称世界各国之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09 年底，全国各级各类年鉴多达 3000 余种，专兼职年鉴工作者超过 50 万人，每年公开出版的年鉴印数达到 600 多万册。

仅从发展速度上看，我国的年鉴事业可谓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但从机构建设、队伍建设、理论建设上看，特别是从质量和效益上看，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的确很多，前景令人十分担忧。从年鉴事业发展的全局考虑，如果不切实解决好机构的建立健全问题、队伍的数量和素质问题、理论研究的滞后问题，以及质量较差、效益较低等突出问题，年鉴之路势必越走越窄，甚至有可能前功尽弃，被时代所淘汰。

就机构建设而言，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归属不当，性质、级别和编制不明确等问题。由于至今没有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各省、区、市的年鉴机构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年鉴工作机构挂靠在同级人民政府办公厅（室），具体工作由办公厅（室）相关领导和文秘人员组织实施；有的省、区、市根据全国《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中关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负责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的规定，把年鉴工作视为地方志工作的一部分，完全交给地方志机构来组织实施；还有一些个别的省、区、市，则把年鉴工作交给统计部门或发展改革部门承编，也有交给当地文化教育部门或文史档案部门承编的。总之，到目前为止，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都没有单独成立年鉴工作机构。

年鉴工作机构的性质、级别和编制，同样是五花八门的。有的地方，年鉴工作机构属行政单位，其工作人员全部纳入公务员制度管理；有的地方，年鉴工作机构属事业单位，大多按照事业管理体制进行管理或参照公务员管理办法进行管理；还有的地方，曾经采用企业管理的模式经营过年鉴工作，但因种种原因，无法维持下去。有的地方，年鉴工作机构既有明确的行政（事业）级别，又有相应的人员编制，明确为正（副）厅（局）级单位的，一般都有 20 至 30 名左右的编制，明确为正（副）处（县）级单位的，一般都有 10 至 15 名编制，但至今还有 70% 的省、区、市人民政府，89% 的市（地、州、盟）人民政府和 95% 的县（市、区、旗）人民政府，没有单独成立年鉴工作机构，其年鉴工作机构的性质、级别和编制，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更令人遗憾的是，负责组织编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的权威机构，至今也没有明确其性质和级别，具体编辑人员也常常是临时抽调组建的班子。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就站在“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的高度诠释年鉴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他老人家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我国的年鉴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由于没有专门的指导机构，在繁荣兴旺的背后，也有许多潜在的危机。譬如，理论研究严重滞后；队伍整体素质较低，而且极不稳定；编辑质量和实用性较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等等。那么，年鉴工作怎样才能在信息化与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把握先机、赢得主动呢？又怎样才能在弘扬良好思想道德风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呢？我们认为，关键是建立健全专门的年鉴工作机构。没有专门的机构，就如同打仗没有指挥部和根据地，而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游击战是永远成不了气候的。同样，委托同级政府办公厅（室）或同级政府地方史志部门代管的方式，也是无法健康成长的。一句话，推动年鉴事业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自上而下建立健全专门的年鉴工作机构。首先，应当建立中央年鉴社，用于指导和管理全国年鉴工作，并负责组织编辑出版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中央年鉴社的职能职责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组织指导全国各地综合年鉴和专业年鉴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负责规划制定全国年鉴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二是负责协调各省、区、市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在编辑出版发行省级地方综合年鉴和国家级部门年鉴中的重要事项；三是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的组稿、编辑、审定和出版发行工作；四是负责培养培训全国年鉴队伍；五是组织开展年鉴理论研究和国内外年鉴界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六是表彰奖励全国年鉴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作为全国年鉴工作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和最具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央年鉴社应当明确为具有行政职能的副部级事业单位，其内设机构应当包括办公厅、总编室、人事教育与政策法规司、理论研究室、地方年鉴工作司、对外交流合作司、出版社、发行部等，编制应控制在 100 至 150 人左右为宜。当然，仅仅依靠中央年鉴社是无法推动全国年鉴工作持续健

康发展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都应当独立设置年鉴工作机构，其机构应明确为同级政府的正厅（处、科）级事业单位。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以及有条件的省级各单位，也应当独立设置本部门的年鉴工作机构，具体负责编辑出版本部门年鉴。总之，在年鉴机构建设上，任何一级都具有承上启下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绝不能出现“断桥”现象。至于省级以下年鉴工作机构的人员编制和内设机构，应因地制宜，不必搞一刀切。

如前所述，我国的年鉴工作者已经超过 50 万人，然而，真正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且长期从事年鉴工作的专职人员不足 5 万人，其余都是一些对年鉴知识知之甚少的临时撰稿人。如果继续依靠这支队伍打拼下去，年鉴事业的前途命运可想而知。所以，建设一支政治合格、作风优良、业务过硬、数量足够的年鉴工作队伍，是我国年鉴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所谓政治合格，就是要做到在思想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切行动都要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统一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上来，使各级各类年鉴成为学习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重要载体；使广大年鉴工作者成为一支自觉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力量。这一点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犹豫和动摇。无庸讳言，长期以来，在我们这支年鉴队伍里，特别是在专职队伍里，有相当一部分人盲目信奉“实用主义”哲学思想，过分强调年鉴的“实用性”，而忽视年鉴的“思想性”。他们往往把胡适先生关于“少谈一些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的言论“提升”到“不谈任何主义，只研究现实问题”的“高度”上来理解。这种错误的思想观点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年鉴不仅不可能成为“国家的需要”，而且完全有可能成为“国家最不需要”的异端。所以，年鉴队伍建设，首先必须抓好思想建设，必须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以理论上的清醒来保证政治上的坚定，以政治上的坚定推动年鉴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所谓作风优良，就是要在思想上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昂扬向上、积极乐观的心态，始终保持脚踏实地、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面对“年鉴”这张“冷板凳”，要有一颗宠辱不惊的平常心，要淡泊名利，宁静致远，切忌心浮气躁、斤斤计较、急功近利和盲目攀比。在工作上要敢于坚持真理，做到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切忌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必须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广大人民群众，切忌闭门造车；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集思广益，切忌独断专行、孤芳自赏、刚愎自用；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记载历史，切忌感情用事，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必须以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为重，保守国家秘密，切忌在搜集整理资料和编辑出版年鉴时泄露国家秘密。在学习上要树立焚膏继晷、刻苦钻研、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学以致用的良好作风，切忌粗枝大叶、一知半解和半途而废。要树立博览群书，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思想，建立一支人人比学习、比知识、比文化、比技能的学习型队伍。同时，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广大年鉴工作者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努力增强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并且始终充满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

力。所谓业务过硬,就是要求广大年鉴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法律法规特别是有关年鉴编辑出版工作的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印刷管理规定、保密法等,不断丰富和提高法律知识修养,树立依法编辑出版年鉴的观念;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给年鉴事业带来的深刻变化,认真思索年鉴经济学规律,努力把年鉴资源转变为年鉴资本,彻底改写“文人陋巷瓢饮”的命运;必须全面了解出版业务知识,譬如书籍的结构、书稿的出版流程、书籍的成本计算以及印张的计算方法和书号(刊号)的含义等,诸如开本、环衬、扉页、护封、晒版、版心等专业术语,都应当全面掌握;必须熟练掌握电脑打印、编辑、排版技术,努力提高年鉴编辑质量和工作效率;必须全面掌握语言学、修辞学、写作学等语言文学艺术知识,积极探索年鉴编辑规律,努力把枯燥乏味的年鉴资料“写活”。所谓数量足够,就是要按照科学的人事编制足额配备专职队伍和兼职人员。专职队伍是年鉴工作的核心力量,一般由总编、副总编、主编、副主编、责任编辑、编辑、校对人员和后勤管理人员组成。兼职人员主要是指各行各业的文字撰稿人员和图片供稿人员,以及年鉴编委会的顾问、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等,他们是不可忽视的或者说是举足轻重的增援部队,是促进年鉴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外围组织。所谓科学的人事编制,是指配备专职人员必须充分考虑专业知识结构、职务职称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民族结构(主要是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使其在知识、能力、性格、作风、经验、体力、精力等诸多方面形成优势互补,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队伍的集体智慧和力量。我们都知道,与党政其他重要部门的工作相比,年鉴工作确实比较单纯,工作量也比较轻松,所以,各级各类年鉴专职人员的配备应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要在“精”字上做文章,每一个专职人员都应该是相当精干的,再配以精良的现代化办公设备设施,这支队伍自然会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精锐之师。当然,团体的战斗力是由一定个体数量来保证的,人员太少就无法分工,也无法实行专业化管理。参照国外年鉴专职人员的配备情况,我们认为,全国年鉴专职队伍保持在6万人左右是比较合理的,具体来讲,国家级综合年鉴的专职人员应保持在30人左右为宜;省级综合年鉴的专职人员应保持在20人左右为宜;市级综合年鉴的专职人员应控制在5至10人为宜;县级综合年鉴的专职人员应配备3至5人。国家级专业年鉴、省级专业年鉴和市级专业年鉴的专职人员,应分别按15人、10人、5人的标准配备为宜。县级人民政府一般不必专门设立专业年鉴编辑机构,其职能职责由县级综合年鉴编辑部门和该单位的办公室共同承担就行。

我国的年鉴事业虽然经历了一百年的实践与发展,然而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专著屈指可数,至今不足10部,而且从1909年到1989年整整80年间,我国的年鉴理论研究专著几乎为零。据笔者所知,1991年,著名年鉴学家肖东发在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年鉴学概论》一书填补了我国年鉴学专著的空白。随后,李维民撰著的《中国年鉴概览》、李今山等编纂的《中国年鉴编纂规范化研究》、许家康等撰著的《年鉴条目及编写研究》、李国新等撰著的《外国年鉴编辑出版概观》、肖东发等撰著的《实用年鉴学》等一批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年

年鉴专著相继问世,有力地促进了年鉴事业的繁荣发展。回顾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年鉴理论研究的历程,总的来说,主要是实用性、应用性方面的研究,对经验、感性认识的一般性总结文章较多,把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的深层次探索文章较少;分散的、自发的选题研究较多,对年鉴学领域的一些基础理论、重要问题和重大课题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专题研究的较少;个别的、局部的、微观的分析研究较多,全面、系统、整体、宏观的综合性研究较少;仅对年鉴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单一的或者说是孤立的封闭式研究的较多,把年鉴问题与国内外同类著述、相关学科进行比较分析和开放式研究的较少。所以,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构建起一套比较完整、比较统一、比较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思想理论体系,甚至连一部比较权威的、公认的理论专著也没有。

我们都知道,没有理论的指导,实践就无法进行,或者说无法有效实施。理论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实践的成败得失,科学的理论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能够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和进程,用它来指导实践,才能有效地改造和利用这个世界,才能促进事物的健康发展。如果用空洞的理论、错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说,加强年鉴理论建设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我们认为,年鉴理论研究必须紧贴时代脉搏,既要用历史眼光审视过去,坚持逻辑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更要以时代坐标观察现实问题,要对西方年鉴理论和我国早期年鉴思想进行大胆扬弃,努力构建中国化的年鉴思想理论体系,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研究年鉴思想理论还必须拓宽认识视野,扩展思维空间,深层次多角度审视和把握国内外年鉴事业发展的总体趋势,从而揭示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年鉴本质属性、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当务之急是:一要利用 3 至 5 年的时间,在全国年鉴界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地开展大规模的年鉴理论探讨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股年鉴理论研究的热潮,形成一种人人都在关心、支持年鉴事业的良好社会风气,起码要在年鉴界基本达成“年鉴是什么”,而“不是什么”的共识。这是进一步深化年鉴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二是由中国年鉴研究会牵头,把年鉴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编制出来,并将它分解落实到各省、区、市相关部门和相关单位,由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直接组织有关专家、学者集体研究。研究成果报经中国年鉴研究会课题评审领导小组审查验收合格后,由中国年鉴研究会负责统一出版发行。采取这种办法,完全能够在 10 年之内基本形成一套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中国特色年鉴理论体系,从而确保年鉴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能有章可循。我们还可把这些比较公认的理论研究专著作为全国年鉴理论培训的通用教材,大面积提高年鉴队伍的整体素质。

如果说机构建设、队伍建设和理论建设是属于具有战略意义的硬件建设,那么,进一步加强年鉴工作常规管理,努力提高年鉴编辑出版质量和经济、社会效益,同样是极其重要的软件建设。管理工作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不外乎就是决策管理、组织管理、目标管理、人事管理、质量管理、效益管理和绩效考核等几个方面。年鉴工作常规管理就是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年鉴工作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存在一个“如何管理”的问题,而决策是一切管理的前提和关键,是执行、指挥、监督、控制、调节的先导,决策正确与否,决定着年鉴工作的成

败得失。有利的客观条件可能会因决策失误而丧失；不利的种种因素可能会因决策正确而变被动为主动。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年鉴工作的决策管理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系统原则。编辑出版年鉴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宏观上讲，无论是中央决策，还是地方决策和部门决策，都是一个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完整体系。即使是最基层的微观决策，如县级综合年鉴的决策，也是一个小而全的系统工程。所以，任何与年鉴工作有关的决策，都应当重视整体效果，充分考虑方方面面的关系，全面分析研究决策对象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反复权衡利弊得失，防止顾此失彼。二是预测原则。预测是决策管理的前提，任何决策都必须在掌握大量有可能影响年鉴工作进度和编辑质量的信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敏锐地推断未来有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对策。三是可行性原则。是否具备实施某项工作的现实条件，取决于决策方案与各种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的统一，如果现有条件与决策方案差距太大，就应当及时修正方案或重新决策。四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决策过程中，如果过分强调民主，必然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媳妇说的半道理”的现象，很难达成共识；如果过分强调集中，就会堵塞言路，难以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决策的科学性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年鉴工作的决策管理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样做，既能集思广益，弥补决策者个人知识和经验方面的不足，防止主观武断，又能避免因意见不一而造成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优柔寡断，延误良机的现象，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除了决策管理之外，人事管理对年鉴工作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人事管理的目的在于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事之间的关系，谋求人与事的恰当配合，建立人与人、人与事之间高度协调的关系，从而达到因事求才，因才施用，乐其所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进而实现最佳工作效果。年鉴工作中的人事管理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采取命令、指示、条例、法规、制度等行政手段，在全国年鉴系统内逐层实施管理。这种方法具有权威性、强制性、无偿性等特点，有利于集中统一，避免出现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现象。二是运用经济手段，即在年鉴工作中借助物质利益的分配机制，合理调节、组织和影响人事管理对象，充分发挥年鉴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当然，这种方法也有一定缺陷，容易出现“多奖多干、少奖少干、不奖不干”的不良现象，干部职工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难以调动起来。三是运用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颁布、制定的有关人事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处理、协调、规范、解决年鉴工作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种方法具有严肃性、权威性、规范性等特点，有利于形成依法编辑出版年鉴的良好局面。四是通过宣传、教育、引导、沟通等思想政治工作，切实解决人事管理工作中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使广大年鉴工作者自觉行动起来，为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奋斗。

决策管理也好，人事管理也罢，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年鉴的编辑出版质量和经济社会效益。所以，质量管理和效益管理应该说是年鉴工作常规管理的中心环节，在各项管理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提高年鉴编辑出版质量必须严把六个关口：

第一，把好政治关。年鉴不是个人著作，不能随心所欲地发表个人见解。年鉴的政治观

点不仅体现在政治部类里，而且贯穿于整部年鉴的每一篇、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条目里。一句话，从头到尾，年鉴工作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这是年鉴的灵魂所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第二，把好结构、体例关。要素的优化并不等于整体的优化，如果不处理好内涵与外延、历史与现状、宏观与微观、点与面、横与纵之间的关系，各部分的质量再好也没用。因为，一部层次紊乱、条理不清、主旨不明、交叉重复、杂乱无章的年鉴，绝不可能是合格的年鉴，更谈不上什么精品了。体例在年鉴编纂中具有纲领性作用，而篇目的设计是年鉴体例的具体体现和运用，是年鉴的骨骼和框架。所以，编纂年鉴首先要严把体例关，科学合理地设计年鉴篇目。

设计篇目的基本原则是：从现代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以符合科学性和时代特点为原则，各章节内容应前后照应，简繁适当，避免重叠；要注意体现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要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和逻辑性。

第三，把好资料关。如果把一部年鉴比作一幢高楼大厦，那么，编辑年鉴所需的各方面材料就如同那些钢筋、水泥、砖块、沙石和涂料。建筑材料不够，施工就无法进行；材料的质量不好，修建起来的楼房就会后患无穷。同样，缺乏必要的资料，年鉴工作就无法开展起来；如果所拥有的资料是虚假错误的东西，那么，靠这种东西编纂出来的所谓的年鉴，必然会遭到世人的唾骂。所以，质量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确保资料的全面、真实、可靠。当然，并不是说真实的资料就一定要采用，还得看它使用价值的高低，看它是否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因为年鉴工作必须考虑政治的因素，必须顾及社会效益。

第四，把好特点特色关。年鉴是时代的产物，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年鉴应具有新时代特点，如实地反映本地区现阶段的状况，既要突出反映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不避讳实践中出现过的这样那样的错误和曲折经历；还要充分体现“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时代风气。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往往是分不开的，每一个时期的地方特色都会留下时代的烙印。所以，在充分反映时代特点的同时，还要着力记述地方特色。人们常说，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中国之大，地方特色是十分鲜明的，年鉴不能千篇一律、千鉴一面，一定要突出个性，全面、深刻地反映地方特色。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地方特色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或少数“独有”、“特有”的事物，而应当从整个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中去挖掘“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小我大、人弱我强”的东西，从整体上突出地方特色。

第五，把好语言文字的记述关。二十多年前，胡乔木同志曾经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指出：“地方志应做到详细，同时应做到简略。所谓详细，指它所应讲到的方面都讲了；所谓简略，就是每个方面的记述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的精炼，要惜墨如金。作为一

部实用性的文献,不能分量太大,分量太大会引起种种不便。这是一种希望,一种不容易达到而又必须达到的奋斗目标。”胡乔木同志的这番讲话的确很有道理,编辑年鉴也应当如此。要做到“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精炼”,“惜墨如金”,就应该注意锻字炼句,做到语言简明,避免说套话、空话、废话。

第六,把好校对关。校对是书刊出版工作中的一道重要工序,也是影响年鉴质量的一项重要因素。校对工作首先要保证不出现政治性和原则性的错字、漏字、多字,保证版面美观、规范,防止格式和字体的错误。其次,要保证整部年鉴的文字差错率低于 $0.25/10000$,达到优质的水平。校对的基本方法是:对校(又称点校)、折校和读校。但无论哪一种方法,都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校正校样上的错字、倒字、横字、多字、缺字,以及接排、另行、字体、字号等差错;二是改正符号和公式的错误;三是检查版式是否符合要求,包括标题、图表说明有无偏斜,字体、字号是否统一,页码是否连贯等;四是检查注解和参考文献的次序和正文所标号码是否吻合;五是注意插图、表格、公式等的位置是否恰当、美观;六是检查行距是否匀称,字距是否符合规定。

古今中外,人们从事任何工作都要讲求效果和利益,年鉴工作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年鉴工作者都应该牢固树立效益意识,积极探索年鉴经济学规律,努力把年鉴资源转变为年鉴资本。尽管编纂出版年鉴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分红,但并不等于年鉴工作可以不讲效益,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管理原则同样适用于年鉴工作。

效益管理,首先要强化时间观念。马克思指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20页)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杜拉克也说过:“有效的管理者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他们能够珍惜时间。”(见《有效的管理者》第30页)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明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道理。人人都知道欲成佳鉴不可速成的道理,但旷日持久、拖拖拉拉的作风只会使年鉴工作变成一项遥遥无期的马拉松,只会拖散人心、拖垮斗志,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人为地增加成本。所以,效益管理必须把时间观念放在第一位,要让每一个年鉴工作者都明白“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生命”的道理才行。

其次,千方百计提高工作效率。如何提高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是每一个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年鉴属于精神产品,年鉴工作无疑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绝不能用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等对待体力劳动的传统方式来管理年鉴工作。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年鉴编纂效益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第一,挑选精兵强将,组建一支高素质的年鉴队伍。实践证明,提高年鉴编纂效率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年鉴队伍的整体素质。年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队伍的整体素质偏低,个人水平再高也无济于事。所以,在今后的年鉴工作中,应当高度重视人才工作,采取各种

办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努力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稳定的年鉴队伍。这是提高年鉴质量和工作效率的根本要求,也是保证年鉴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无论是专职人员,还是兼职人员,凡是参与年鉴工作的人都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是必须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二是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传真机、复印机等现代化办公设备;三是能够拿出有分量的文章来证明自己的写作水平和文字功底;四是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五是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如果本地区招不够这样的人才,就应当面向全省、全国公开招聘,绝不能让那些既无德又无才的人混进年鉴队伍里,影响年鉴的编纂质量和工作效率。

第二,改善工作条件,运用现代化手段提高工作效率。过去,由于没有财力安装空调,每到寒冷的冬季或炎热的夏季,年鉴人员就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想尽一切办法取暖或降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鉴的编纂效率。而今,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全国绝大多数年鉴机构都有能力安装空调,年鉴工作者一年四季都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室里工作,工作效率自然会比过去高得多。十多年前,电脑、传真机、复印机、扫描仪等现代化办公设备对于许多单位来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特别是像地方志办公室这样的“清水衙门”,就连安装一部无绳电话都是一种奢望,更谈不上购置电脑了。广大年鉴工作者只能用传统的方法一笔一画抄资料、撰稿、修改、总纂,一针一线订文稿、档案。更为严重的是,一年半载了解不到一个信息,上下级之间的思想交流十分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年鉴工作,要想提高工作效率是相当困难的。如今,我国已完全进入信息化时代,在年鉴编纂、管理和运用过程中,引入现代信息技术,让广大年鉴工作者通过互联网方便、快捷、及时、准确地了解自己想知道的东西,从而避免年鉴资源的闲置、浪费和重复建设,从根本上降低工作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已成为一种现实。各级地方志办公室只要稍加努力,就可以实现人手一台电脑、一人一部电话、一人一间办公室,打字、复印、传真、收文、发文都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年鉴工作,效率必然会得到很大提高。

第三,实行承包制,充分调动广大年鉴工作者的积极性。出工不出力,一天就能完成的事情,总是拖到五六天后才了结;一个人就能胜任的工作,非得交给三四个人干。这就是年鉴工作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时情况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工作成绩与个人所得并无直接关系。实践证明,没有同个人利益挂钩的工作,其质量和效率是无法得到保证的,光靠思想教育和精神鼓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在今后的年鉴工作中,采取层层承包的方式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所谓层层承包,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认真评估分析之后,按照互利互惠的原则或适当优惠年鉴工作者的办法,将编辑出版年鉴所需的经费(包括资料收集整理费、文稿打印费、审稿费、编辑校对费、差旅费、出版印刷费、稿费等等)一次性或分两次划拨给同级年鉴工作机构,并与同级年鉴工作机构签订《编辑出版年鉴承包合同书》。年鉴机构与同级人民政府签订编辑出版年鉴承包合同之后,又根据自己掌握的经费和完成年鉴工作目标任务的需要,与各部门主编签订《部门年鉴

承包合同书》，将经费和任务落实到部门年鉴主编身上。同理，年鉴主编也根据手中的经费和完成本部门年鉴任务的实际需要，与本单位的具体负责人员签订最后一层承包合同。这种层层签订承包合同的做法，实属公私两利、各得其所，而且有了这样一层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关系之后，就能够充分调动广大年鉴工作者的积极性，年鉴的编纂质量和工作效率自然也会得到提高。

现代西方年鉴被称为“刊中之王”，有人甚至把年鉴看成是“具有政府公报性质的蓝皮书”。为了加快我国年鉴理论研究步伐，促进我国年鉴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我们组织全国年鉴界的专家学者共同编撰《中国年鉴学研究》一书，经过三年的努力，《中国年鉴学研究》一书终于编撰完成，即将由巴蜀书社出版。该书由“年鉴基础理论研究”、“综合年鉴的编纂”、“专业年鉴的编纂”、“年鉴管理工作”、“外国年鉴简介”等五个部分组成，内容涵盖年鉴工作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年鉴学著作。该书的出版发行，必将有力地推动各级各类年鉴的健康发展。在编撰过程中，我们还十分荣幸地邀请到中国年鉴研究会会长许家康同志，副会长许进禄同志、房德胜同志和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肖东发同志担任顾问；同时邀请到四川省志编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小彬同志担任编委会主任；四川省志编委会副主任罗亚夫同志和著名年鉴学家、四川省交通厅志鉴总编黄丽女士担任编委会副主任，并得到了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目 录

序	马小彬 (1)
前 言	(1)

第一篇 年鉴基础理论研究

论年鉴创新的三个问题	(3)
地、县级年鉴编纂规则	(9)
电子版年鉴制作的几个问题	(14)
年鉴创新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17)
年鉴理论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22)
更新年鉴理念, 突出年鉴主题	(26)
年鉴编纂应体现以人为本	(29)
年鉴条目编写常见“病”	(31)
年鉴条目编写的几点思考	(34)
年鉴新意初探	(41)
年鉴语言四忌	(43)
在创新实践中突出年鉴的个性化	(45)
年鉴撰稿应注意的几个角度	(50)
年鉴应加大问题性条目比重	(52)
增强年鉴信息价值的途径	(54)
改革创新, 努力实现年鉴的信息化、大众化	(56)

发展网络年鉴需要体制创新	(58)
年鉴“大事记”的编写要领	(61)
关于创立年鉴品牌的思考	(64)
论年鉴的资料性、可读性	(66)
关于年鉴条目撰写突出年度工作特色的思考	(68)
关于年鉴创新的思考与实践	(71)
关于年鉴规范与创新问题的思考	(75)
编纂精品年鉴的几点思考	(78)
谈谈地方年鉴的定位与创新	(81)
年鉴编纂工作中需处理好的四个问题	(83)
关于设置常规条目的现象分析	(86)
年鉴读者细分与定位探讨	(89)
年鉴的多样化趋势及其对城市综合年鉴的影响	(94)
对地方年鉴转型问题的几点思考	(97)
认识年鉴，走出误区	(103)
年鉴创新的困难与对策	(106)
统计数据在年鉴中的规范化运用	(110)
增强图片条目意识，提高年鉴编辑质量	(116)
随文照片是鲜活年鉴的又一生命线	(119)
谈谈年鉴彩页的设计创新问题	(123)
年鉴风格、形式、内容创新的逻辑思考	(126)
索引的定位与编制	(130)
年鉴信息的选择定位与表现形式	(132)
试论美术编辑在年鉴编辑中的作用	(137)
我国早期年鉴编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40)
年鉴记述政治文明建设初探	(145)
对年鉴记述非公有制经济资料的几点建议	(148)
年鉴资料工作要与时俱进	(152)
年鉴索引及其编纂实践	(155)
关于开发年鉴编写软件的设想	(159)
影响年鉴创新发展的两个根本问题	(162)
浅谈年鉴的著作权	(169)
编纂党委年鉴初探	(173)
浅谈英文版年鉴的编纂	(177)